

##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 从埃及剧变透视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

李 意

**摘 要:** 2010年底以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革命浪潮从北非国家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本文以埃及抗议活动为例,从利益结构失衡论、制度供给不足论、心理落差论及地缘政治论等政治学角度出发,分析中东国家政治变革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若干可供选择的转型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中东国家民主政治转型中遇到的困难,说明在中东成功的政治转型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与普适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 埃及;威权主义;政治变革;民主转型;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 李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在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4-0040-10

**中图分类号:** D73/77.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和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2010年12月以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抗议浪潮从北非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和利比亚等国相继发生群众抗议事件,纷纷示威反对独裁统治。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从全球范围看,这无异于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发生在该地区的一次“板块地震”。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浪潮正呈现难以把握的外溢效应,它使贫困、社会不公和独裁等问题暴露无遗,并与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日渐衰弱结合在一起,对中东地区及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地区,如何确立世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困扰中东各国发展的一大政治难题。尽管阿拉伯民众通过抗议活动推翻了原本相当稳固的专制政权,但在动荡之后,这些国家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秩序,实现成功的政治转型仍是个艰巨的任务。本文从埃及抗议事件产生的原因入手,通过探讨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尝试提出若干可供选择的转型模式,进而揭示中东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困难及前景。

## 一、埃及剧变产生原因的政治学分析

2011年2月12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军方,

历时 18 天的抗议活动终于以穆巴拉克的下台宣告结束，标志着穆巴拉克时代的终结。在一个“中东强人”逐渐消失的时代，接受考验的不仅是埃及、突尼斯，同样也包括所有中东地区国家。是什么原因使向来较为稳定的埃及世俗化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这些现象给我们怎样的启迪？下文将从政治学角度对埃及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 1. 利益结构失衡论

古典政治学集中讨论“良政善治”的意义和条件，并运用结构分析方法，论证了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对于良好秩序的重要意义。按照古典政治学的观点，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和好的社会秩序，应该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是造成社会不满、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抗议和社会冲突的根源。由于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sup>[1]434</sup>，因此，客观的利益结构失衡和利益关系紧张也在社会阶层成员的心态、价值观乃至阶层关系运行规则中得以体现。

利益结构一旦失衡，抗议活动便随之而来。它通常发生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里，是社会政治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产生动乱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以及社会力量全面失衡，如当局的专制、腐败、无能和暴虐，政治统治能力的衰退，官方意识形态的崩溃等。它们几乎都是独裁、专制政府，腐败问题长期存在，即将到来的民主进程被侵占，从而诞生了由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支撑的专制政权，一些国家政府甚至还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结盟。<sup>[2]</sup>由于失衡的社会缺乏自我调整和修正的能力与机会，极易使大量新增的政治参与行为溢出现行政治框架之外，随着这些行为广泛、迅速、猛烈地扩张，最终摧毁超负荷的现行政治结构。同时，现行的传统社会政治制度过分僵化以致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应变能力，不能容纳当前迅速膨胀的参与行为，从而导致社会成员普遍而严重的抗拒行动以及“爆炸性参与”。埃及抗议事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成员过高的政治期望与政府的过分低能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有时候是由于后者的增速低于前者而造成的相对的和动态的不协调——而导致的结构性机能调整。

长久以来，阿拉伯世界死气沉沉。埃及的革命正设法令其复兴。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阿拉伯人开展反殖民斗争，领导人有自己的立场、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还设定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反抗外国统治的任务。阿拉伯领导层曾经支持过一系列伟大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反抗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虽然不都是成功的，但都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然而，如今它完全失去了斗志，阿拉伯政治销声匿迹了。除了等着看别的国家准备怎么做，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明确和有效的方法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它们奉行的政策又违背了民众的意愿。<sup>[3]</sup>在埃及抗议活动发生前，埃及已经丧失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曾经是地区大国的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不断下降。埃及在伊拉克问题上不见踪影，对伊朗政策一直限于抗议、抨击和侮辱；埃及在与叙利亚的较量中没有占到上风，在争夺对黎巴嫩的影响时也输了；埃及对阿以和平进程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而在以色列围困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时，埃及被该地区广泛视为与以色列串通一气。事实证明，阿拉伯领导层是消极被动的，这与阿拉伯阵营力量的下降有关。

### 2. 制度供给不足论

在 20 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发展研究中，现代化与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家们关注的中心议题。社会稳定不过是社会需求与制度供给达到相对平衡的结果或状态。相对而言，社会需求是更加积极的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制度供给则是相对稳定的因素，随着需求的

变化而不断调适。在现代化发展阶段，作为社会动员力量的社会各种要素急剧变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社会需求，使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出现严重“不适应”，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实现社会稳定的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于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制度“扩容”，为不断变动之社会需求的表达和实现提供可容纳的制度框架和空间。依照这种理论可以判断，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那就说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出了问题。

埃及的政治制度为总统独大制，其基本特征是总统独大，议会弱小，司法相对独立，新闻有限自由，它与埃及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过程基本适应，总体上有利于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在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下，若精英阶层不能对传统文化和制度进行反思，那么局势动荡就在所难免。此外，埃及政府的几次修宪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彻底地打开了控制这场洪水的最后闸门。革命给不发达国家的受压迫和被剥夺的民众提供了一种非程序化和自主的政治参与空间，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那样以历史前进中的主动因素和新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随着社会成员的信仰、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等变化，大众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与顺从、忍让阈值相关的社会成员的不满足感、挫折感、疏离感和敌对情绪的滋长，最终导致抗议事件的爆发。

### 3.心理落差论

当代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学派十分关注人们的心理动机，旨在研究什么样的动机会促使一个人卷入暴力活动之中。该学派认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受其心理支配，而个体心理的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和感知；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是人们投入叛乱或暴动的心理根源。美国学者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曾在《人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到一个关键概念：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集体暴乱。他的结论是，人们是否投入叛乱取决于他们对心理期望值（Value Expectations）和实际实现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间差距的理解，即人们对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差距的认识。<sup>[4]35-52</sup>对于当政者来说，最危险的情况莫过于人们的期望值在增加，而满足需求的能力在下降。这种观点在“J曲线理论”<sup>①</sup>中得到了积极回应。

21世纪以来，埃及政府为解决经济持续低迷的问题，接连在2004年7月和2005年12月两次重组内阁，改革派经济学家纳齐夫出任总理，肩负起振兴埃及经济的重任，埃及由此进入“第三代经济改革”，它“依据一种全新的思想展开，紧跟全球经济的步伐，增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为私营企业提供机会，使私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创收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sup>[5]69</sup>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有给埃及的政治体制带来良好效果，却给埃及的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即高通货膨胀率（2008年11.7%、2009年16.2%、2010年11.7%）和高失业率（2008年8.1%、2009年9.0%、2010年9.2%）。<sup>[6]</sup>改革的失当造成财富分配不均，过分的两极分化，导致埃及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率骤升、社会福利保障严重缺失。其中90%的失业者是青年，促使年轻人成为这次动乱的主力军。埃及8000万人口中，有近一半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无疑在民众中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收入悬殊和分配差距的拉大刺激了人们无视历史进步的事实，从而形成社会不满心理，最终导致埃及抗议事件的发生。

### 4.地缘政治论

地缘政治学属于生态政治学范畴，通常指政治现象中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sup>①</sup> 该理论认为，社会暴力事件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值在不断上升，而政府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却在下降。

从地区环境看，埃及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显然是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鼓舞，这就是所谓的周边国家发生革命的“示范效应”。近 20 年来，突尼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际形象开明，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持续偏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突尼斯的就业环境日趋恶化。虽然本·阿里在执政期间为突尼斯的经济成长作出过不少贡献，但其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政治家族、不容忍不同意见、不重视民众的改革呼声等，都成为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可见，在人民的意愿面前，阿拉伯世界那些国王、埃米尔和总统们都不再是刀枪不入的。<sup>[7]</sup>当世界在改变、在进步时，阿拉伯国家无法置身事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试图用空话和表面文章来应付广大民众。

从国际环境看，国际政治的严重危机，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削弱加速了埃及政治变革的进程。约瑟夫·奈在其新著《权力的未来》中提出“权力扩散”理论，称当今所有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事情的发生是它们无从掌控的，即使对最强大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sup>[8]167-81</sup>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自然是指美国。近年来，美国中东战略体系面临重重危机，其对中东地区控制力不断下降。伊拉克战争的巨额耗费极大地拖累着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实力。同时，在如何打破巴以和谈僵局、推动两国方案等问题上，美国已无能为力。美国的中东战略政策之所以陷入危机，是美国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前者指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其国家利益，为此，美国与中东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无论它是传统君主制国家，还是世俗的共和制国家，并竭力维护相互间的稳定关系；后者指美国处处标榜民主，鼓动并支持一切反政府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并为此制定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频频向中东盟国施压，推动美国式的改革。在此次埃及变局中，美国政府对待穆巴拉克政权和示威民众的态度表现得摇摆不定，正说明美国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的冲突在于它既不愿意放弃民主的大旗，又不愿意放弃亲美政权。这种内在矛盾一方面导致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屡屡失败，另一方面构成了中东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

本质上，这次抗议浪潮的根源还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内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长期执政中不仅用尽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独立”等为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等提供了统治的充分合法性），而且逐渐陷入系统性的贪腐，在国家治理上缺少创新，显得愈加无能；他们解决了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远远少于新增加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而问题和矛盾日积月累，其实早已使这些国家到了社会危机的地步。中东北非地区很久以来似乎就是世界政治中的“不毛之地”。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范围（包括非洲大陆本身）的民主化潮流，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却仍然没有跟进改革其过时的政治体制，失去了重大的政治革新的机会。不管欧亚非三洲的政治版图发生多大变化，出现过多少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而阿拉伯世界好像始终没有参与这段历史，甚至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sup>[9]</sup>如今，政治变革的大潮将这些局势动荡的中东国家推到风口浪尖上，迫使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思考本国政治转型的前景，从而选择适合的转型模式。

## 二、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及模式

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是在对以往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修正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在比较政治学发展理论上的开创性研究。1960 年，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出版了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向，学者们纷纷前往非洲、亚洲、拉美

和中东地区研究“发展”。政治转型关注的对象不仅有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南欧、俄罗斯、东欧等“新兴国家”。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政治转型更加侧重于关注这些国家在完成经济体制转型之后，能否出现政治转型、如何出现政治转型、转型之后能否出现巩固的民主等内容。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普沃斯基做过这样的描述：“转型就是从旧政权走向新共和国。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种过渡是否会导致一种巩固的民主体系，在这样的政治体系内，相关的政治力量把其利益与价值托付于不确定的民主制度博弈，并服从民主过程的结果。”<sup>[10]36</sup>

一般认为，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要经历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以及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而只有经过民主巩固期——国家接受了民主作为各个阶层、集团解决社会冲突的调节机制，并愿意和主动接受有民主体制安排所带来的各种结果，政治转型才可谓成功。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讲，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走向了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要同时关注以下两点：一是看其能否有利于真正扩大代表性，使政策真正体现多数意志；二是看其能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普沃斯基指出，在专制体制崩溃，民主提上日程的转型时期内，有可能出现各种变数。在转型论者的理论期待中，民主化转型过程是不确定的且极具复杂性；即使发生了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也是长期而艰难的；同时，民主化的“路径”也具有多种可能性。<sup>[10]61</sup>因此，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政治转型并非直接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应沿着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渐进路径前行。

转型路径的选择是当前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政变后的中东国家，应该选择哪条路径呢？以中东国家现存的三种政权组织模式为例：有以动荡前埃及为代表的军人主导的世俗化加个人长期执政模式，即“个人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有以土耳其为代表的高度世俗化的亲西方模式；还有以沙特等海湾国家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度模式。

所谓“土耳其模式”，是指在伊斯兰教政府的统治下生气勃勃，独立自主，显示了伊斯兰教是可以和现代化和睦共处的。从政教合一，到全盘西化，再到伊斯兰复兴，最后在民主政治与伊斯兰传统的平衡中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土耳其长达 80 年、并仍在继续发展的政治转型是中东国家的一个典型。总理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已经在该地区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如在 2010 年 6 月以色列对土耳其慈善机构组织的加沙支援舰队的致命军事袭击上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等事件，逐步强化了土在一般阿拉伯人中的形象。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自从 1923 年建立共和国以后却一直深受凯末尔倡导的世俗化主义影响以及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因此，土耳其在 20 世纪的多半时间中有意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疏远，并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俗化的欧洲国家。20 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土耳其国内开始兴起“政治伊斯兰”风潮。这种风潮的出现让土耳其许多政治派别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去伊斯兰化运动并没有将伊斯兰的影响从土耳其社会中全面铲除。事实表明，伊斯兰政治势力依然代表着土耳其巨大的社会力量。2005 年以后，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失望，促使其开始转回中东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随着土耳其国内较为保守的伊斯兰势力对外交事务发挥的影响日益加强，埃尔多安总理的前顾问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教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终于开始转向，集中精力发展与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新政府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全面复兴伊斯兰文明，清洗欧洲殖民文化，再造土耳其的地区强权。

所谓“沙特模式”，是指它所要实现的民主化，既非东方的“共产主义”，也非西方的“自由民主”，而是带有伊斯兰教特征的“伊斯兰民主”。沙特阿拉伯是由沙特家族高举着伊斯兰瓦哈比教义的旗帜，在阿拉伯半岛上通过部落征服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建国以后，创立了以家族

统治为核心，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被誉为“沙特现代化之父”的国王费萨尔早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就领导沙特进行了一场现代化改革，改革起源于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是王权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费萨尔吸收新兴阶层参与政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了沙特实行伊斯兰君主制，也没有削弱沙特的王权，国王直接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政府机构。费萨尔为改革确立了“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沙特仍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政治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官僚体系来维护沙特家族的长久统治。费萨尔国王曾明确指出：“我们要伊斯兰，不要东方的主义，也不要西方的主义”。<sup>[11]</sup>无论沙特怎样发展，它始终保留了完整的伊斯兰特性。费萨尔国王及其后的沙特统治者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现已取得良好的效应。

在埃及抗议事件爆发后，几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都对埃及投以了相当多的关注。沙特希望埃及保持稳定，使自身的君主制免受巨大冲击；土耳其希望埃及进一步实施民主改革，进一步世俗化；伊朗则期望宗教力量能在埃及掌权，并号召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紧紧团结在宗教领袖周围，共同对抗西方侵略政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表示愿意保持伊斯兰特色的民主改革和政体，而不是完全西方化的民主。他们不希望中东地区出现“连锁崩溃”，海湾富国甚至毫不犹豫地掏腰包、拨巨款支援“穷阿拉伯兄弟”渡过难关。埃及该选择哪种模式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无疑是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

纵观 20 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在 100 多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只有 20 多个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民主体制或者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大多数民主化国家既非民主也非独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而是陷入了一个“灰色区域”<sup>[12]</sup>。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特征如定期选举、有限的公民社会等，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忽视、代表性不足、司法不公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威权政权的转型特点决定的：在转型过程中，主要政治行为者包括前威权政权内部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它们之间相对的力量、地位和战略互动构成了不同的转型方式。威权政权中的改革派试图通过自由化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却不被强硬派所接受。在民主反对派中，温和派愿意与威权政权的精英进行谈判，但激进派却拒绝合作。这样，当强硬派与改革派结盟、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时，就会形成两个对立的联盟，双方必然发生激烈冲突，威权政权或是保存下来，或是遭到解体。如果改革派与温和派结盟，并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结果就是有保证的民主。当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而改革派又同温和派结盟时，将出现无保证的民主。当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温和派又与改革派结盟时，将出现威权政权的自由化。<sup>[10]49</sup>可见，政治转型的展开通常伴随一连串的协商、妥协的过程。当各方能够找出一种制度安排——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在民主竞争中受到过多损害——的时候，民主化才有可能。

### 三、中东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困难及其三大因素

埃及事件代表着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典型。这场已席卷多个国家的动荡，体现了阿拉伯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内部危机。虽然埃及、突尼斯等共和制国家经过了多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正在逐渐健全宪政民主形式，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和法制化机制，使政治制度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形势，但这些国家尚未改变执政党长期占主导地位 and 总统个人集权的政治格局。普遍而言，在中东地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军人统治或者其他形式的威权主义模式，它们都没有在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方面作出什么贡献。”<sup>[13]9</sup>

中东的这波动荡说明，原本的强人政治或者说威权政治已经不行了，但民主政治也未必行得通。”事实上，从1972年到2003年间，77%的威权主义政府权力更迭产生了新的威权主义政府，只有23%的转型产生了民主。<sup>[14]</sup>更何况，这场发生在信息时代的抗议行为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没人知道未来的走向。传统的民权运动通常需要极高的组织性和行动纲领，凭借精确性和纪律性对现存秩序形成挑战。但在以突尼斯和埃及为首的事件中，参加者在组织性和制度性上极为松散。与传统的革命具有很大的不同，民众只是被贫穷、失业和不公点燃愤怒，目标也仅限于推翻现政府，因而难以在一时间形成较为明朗的局面。具体而言，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面临以下困难，包括经济因素、地区因素和宗教因素。

1.经济因素。通常情况下，转型国家总会面临一定的经济困难和经济政策选择问题，其核心是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海哥德和考夫曼认为，新民主国家经济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分配问题。当威权政权的限制被排除后，过去的分配冲突重新出现，导致过去被压制群体的要求爆发，这些要求同时也伴随着过去优势团体为了确保自己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大量的利益要求是新民主政权面临的最主要问题。<sup>[15]281</sup>普沃斯基也指出，新民主政权的维持依赖其经济表现。大多数民主转型的国家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危机，那些对公众要求作出回应的政府将因民众抗议而不得不修改经济改革计划，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一方面，这使得民主治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众抵抗伴随着经济改革而采取的强制措施等运动，将导致政府可能回到威权主义。<sup>[10]154</sup>于是，从经济危机中转型而来的政府，既面临着改革的机会，也面临着政治困境。对于刚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让经济继续运行在成长轨道至关重要，而这意味着新领袖可能需要与那些曾经受益于前政权甚至前政权内部的人合作。当行政机关具有更大的权力来执行政策计划时，则有可能破坏民主的巩固。可见，在建立过渡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权衡的方面很多：政府权力过大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但政府权力不足又无法有效阻止建设繁荣的包容性社会所必须的群体行动，也无法保护弱者不受权势部门的压制。<sup>[16]</sup>

2.地区因素。民主化有很多明显的共性，而另一些则是地区性的。伯恩斯指出，地区因素对民主化的某些方面没有影响，对另一些方面却是关键。<sup>[17]203</sup>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所处环境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性成为转型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内容。埃及等北非国家属于中东体系，是当前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对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中东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从诞生伊始就带有内生的缺陷，并非完全独立的体系。同时，由于中东社会所独具的宗教文化特质和共同的历史经历，中东的国际体系又表现出一种“大家庭”的特色。鉴于此，埃及等国的政治转型毫无疑问会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

3.宗教因素。民主化是一种制度变迁，无论突发式的还是渐进式的，这一变迁都不可能脱离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即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伊斯兰教是一种涉世性极强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是其根本特点。在伊斯兰看来，反抗暴政不仅是一项天赋权利，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宗教义务。伊斯兰教认为，一个地方发生革命是由于那里长期存在着暴政和过分的压迫。当一个政权违背真主的神法并且把人民当作奴隶和牲口加以对待时，它就不再是合法权威，而是暴政和暴君，人民理应凭借真主先前赋予他们的神圣代治者身份和反抗权进行推翻和废黜。事实上，在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真主统治之下，人民有权管理自我、安排自己的制度、组建自己的政府、选择国家领导人并且参与制定国家重大决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幸福并且对这些目的负有责任，如果它本身违背了这些目的并且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利益，那么变革这种政府就不仅符合民意，而且也符合神意、合乎

神法、顺应历史，同时在道义上必然是正当的。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导致中东伊斯兰国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这一干预变量表现为较强的惰性力量，阻滞了民主化进程。中东伊斯兰国家民族文化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对抗。<sup>[18]</sup>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由伊斯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内容组合而成。它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存在并产生政治作用，具有所有政治体系生存发展的共性，而它的宗教性、历史性和在各时期生存的社会背景又赋予它中东传统宗教政治的个性，这就决定了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它与世俗民主政治的根本对立。这种传统宗教政治在思想理论、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与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适应，与全球化趋势也不融合，因此在实践中产生了尖锐矛盾和诸多问题。这种不相融性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政治作用。

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观念趋于世俗化。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是各个时代埃及民族性的核心因素，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穆斯林内部并不具有同质性，苏非派倾向于视伊斯兰教为一套宗教修持的象征，赛莱菲耶派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套必须严格遵守的生活规范，穆斯林兄弟会则视伊斯兰教为一种社会政治体系。在埃及政变中，异军突起的不仅仅是过去合法存在的反对党，还有极端的伊斯兰政党。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它拥有 80 多年的政治奋斗历史，虽被穆巴拉克政府以“非法组织”名义取缔长达 30 年，但现已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因其“非法”身份从埃及政变一开始没有出头露面，但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逐步走向历史舞台。2011 年 2 月 22 日，穆斯林兄弟会组织正式宣布组建新政党——埃及“自由与公正党”，通过扩大和吸收党员，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虽然新政党表示无意于争夺国会多数席位，也不打算提出总统候选人，但如果大选自由和公开，兄弟会事实上可望获得国会 30% 的席位。如果这样，兄弟会将坚持建立以来的最高奋斗目标——伊斯兰是建国大纲。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尤其是政治伊斯兰在本轮北非动乱中虽然没有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伊斯兰教将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宗教集团并未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削弱其对政权的向往。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兄弟会早已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蒂尔玛沙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合法政治斗争，但不容小觑的是，兄弟会内部在政治战略上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选择在“自由与公正党”的参与下选择一种过渡的军事民主，另一部分人则拒绝自毁名声以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此外，兄弟会还不得不面对其他教派的牵制与影响。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国家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陷入失望与迷茫的民众往往习惯于从传统宗教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美好理想的答案。各国政治反对派利用宗教推波助澜，也会使更多的民众“回归宗教”。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险些颠覆民族主义政权和土耳其伊斯兰繁荣党执政，到近年来埃及、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广泛参政和 2006 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获胜并执政等，都表明非世俗化在中东国家有重新泛起的势头。本质上，伊斯兰教与“世俗化”是背离的，因为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一个入世性极强的宗教，其经典《古兰经》不仅规定了认主独一、笃信安拉等六大宗教信条，规定了五大功课和有关的宗教礼仪，而且它本身也是确立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的根据，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准则。可以说，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相比，中东世俗制国家的局势之所以动荡不安，伊斯兰因素占据很大的成分。埃及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代表着埃及政治的发展方向，但是社会的传统因素和传统政治文化相当强大，在保守的老百姓眼中或多或



少有“西化”之嫌，故其社会基础相当薄弱。

近年来，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表明，宗教极端势力可能借变局上位。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却出乎意料地帮助伊朗提升了战略地位，为伊朗消灭了一个宿敌，推翻了伊拉克逊尼派政权，什叶派跃居伊拉克主导政治力量。甚至近10余年来美国视为大敌的基地组织，究其起源，也是当年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用以抵御阿富汗苏军的。埃及抗议事件发生后，伊朗官方就表示将中东各国的抗议行动定性为“反对世俗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欢呼“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sup>[19]</sup>依照美国的规划，埃及将来的政权必须以最亲美的军方为基础，配合民主党派甚至民主人物，如巴拉迪组成政府，兄弟会当然不会被排斥，但稀释其力量、限制其发展显得尤为迫切。看来，对埃及等政变国家来讲，要把汹涌的抗议浪潮转化为国家政治生活常态，将临时的设想变为法定的秩序，必须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反复讨论。不同的阶层和宗教教派的差异，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再加上外力的推动或阻滞，要组成一个有效的联合政府显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 四、结语

自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型或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中东国家没有抓住政治革新的机会，始终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严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从而导致埃及等国家的政治动荡。埃及原来的政治模式具有鲜明的“个人威权主义”色彩，其统治规则通常是一个人的政府，他使用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工具促进他自己垄断权力的目的，并且拒绝给与那些同他竞争的组织以政治权利和机会。因此，民众通过抗议活动推翻现政权，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很高。然而，威权主义政体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民主化的开始，因为它很可能只是让位于另外一个威权主义政体。如果说民主转型通常由一个政治事件而引发，那么，转型后的民主巩固却不仅仅是一个变革事件，更主要的是民主在社会整体中稳定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需要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综合的协调发展，才能得到巩固和持续。因此，对于埃及等中东国家来说，推翻一个独裁者仅仅是民主的第一步，建立并巩固民主制度，往往更艰难、更重要。不论如何，中东国家都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与普适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特别是不能忽略伊斯兰教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2] 爱德华·卢西塔. 阿拉伯群众的动乱在整个北非蔓延[N]. (西班牙) 起义报, 2011-02-03.
- [3] Kouros Ziahar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ab World[N]. The Washington Post, 2011-03-15.
- [4]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5]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国家新闻总署.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年鉴（2005年）[M]. 开罗：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 2006.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埃及失业率上升至 9.4%[EB/OL]. [2011-06-03]. <http://eg.mofcom.gov.cn/index.shtml>.
- [7] Michael Gerson. Arabs' Urge for Self-government Shouldn't Be A Surprise[N]. The Washington Post, 2011-02-01.

- [8]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Power[J]. Public Affairs, 2011 (2).
- [9] 吉勒·凯佩尔. 革命的挑战[N]. (法国)世界报, 2011-02-06.
- [10] 亚当·普沃斯基.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M]. 包雅钧,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吴彦. 费萨尔改革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现代化[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6 (1).
- [12]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1).
- [13] 霍华德·威亚尔达. 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M]. 董正华,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4] Axel Hadenius, Jan Teorell. 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 (1).
- [15] Stephan Haggar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7 (3).
- [16] Joseph E. Stiglitz. The Tunisian Catalyst[N]. The Jordan Times, 2011-02-06.
- [17] 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0 (6).
- [18] 丁隆.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6 (6).
- [19] 高祖贵. 中东新变局挑战美国利益[J]. 世界知识, 2011 (6).

## On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 Case of Egypt

LI Yi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2010, the revolution that requi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swept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 protesters put forward the political demand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r king to step down, fair elections, government reshuff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tics, protecting civil rights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ample of Egyptian protest,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ory, systems theory of insufficient supply, the psychological gap theory and the geopolitic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ry to find an alternative transition model. On this basis, by reveal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riter thinks that the success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eds to integrate identity and universality, and coordinate the uniqueness and local nature.

**Key Words** Egypt;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Change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lam

(责任编辑: 杨 阳)